

灵瑞百札：

黄炎培与姚维钧情书家信集

黄方毅 杨晓娟 整理



灵瑞百札：

黄炎培与姚维钧情书家信集

黄方毅 杨晓娟 整理

责任编辑:杨美艳

装帧设计:徐 晖

责任校对:吴海平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灵瑯百札:黄炎培与姚维钧情书家信集/黄方毅 杨晓娟 整理.

-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2.11

ISBN 978-7-01-011330-2

I. ①灵… II. ①黄…②杨… III. ①黄炎培(1878~1965)

-书信集②姚维钧(1909~1968)-书信集 IV. ①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47148 号

灵 瑯 百 札:

LINGDANG BAIZHA

黄炎培与姚维钧情书家信集

黄方毅 杨晓娟 整理

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)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10 字数:180 千字

ISBN 978-7-01-011330-2 定价:29.8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:(010)65250042

序一：我与《灵瑯百札》

《灵瑯百札》，一部古色古香的信札，外面是紫红色封面纸夹，里面装着一百几十封信及诗词，是20世纪40年代初我父亲黄炎培与我母亲姚维钧的相恋情书。

1937年抗战开始，黄炎培离开故土上海，辗转武汉、长沙来到陪都重庆。留在上海的父亲前妻于1940年底病故。1941年底父亲赴贵阳大夏大学（今上海华东师大，抗战时期迁址更名为大夏大学）讲学，母亲在台下听讲，心中再次涌动着少女时代就对父亲萌发的爱意。父亲返回重庆后两人开始书信往来，用纸和笔开始了他们的感情历程。他俩从以师生相称叙述家常的一般友人开始，进而成为相谈甚欢的邻乡好友，再又变成情意日浓盼对方来信如大旱之中望云霓般的情侣，终成未曾谋面却信定终身的待婚夫妻。近一年时间来往书信一百零七封。1942年我母亲姚维钧大学毕业，刚刚照完毕业照的母亲很快脱下黑色学士礼服，拿上行李离筑赴渝奔向父亲，经十余天筹备后便披上新婚礼服。友人张一

磨、穆藕初、杨卫玉作证婚或介绍，沈钧儒等“陪都”名流参加。黄姚当场散发告亲友书介绍婚事经过，从而为这篇浪漫之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

为什么取名“灵瑯百札”呢？

先说“灵瑯”两字。1942年7月27日，黄致姚信即《灵瑯百札》中第100封信时，姚维钧即将修毕大学等待赴渝，这一天是黄姚团聚之前最后一次月圆，他俩之前信上相约将各在渝（重庆）、筑（贵阳）两地同时赏月。赏月中黄写下六首词，原名“月诉”，后来改为“灵瑯词”。其首节如下：

月 诉

维钧既修毕大学业，将自筑来渝，践白首之约，谓此最后一度月圆，在离别中弥足珍视。约以七月廿六日，即阴历六月十四日月圆之前夕下午八时至九时，异地同时赏此月色，而各写所怀，余因成斯制焉。

佳日兮良辰，
孤月兮双江。
山房兮云树，
张之园兮夜未央。
思佳人兮来迟，
诉家园兮回肠。

乞灵娥其谛听兮，
愿在耳而为珰。

这即是“灵珰”两字由来。

1954年8月16日黄姚结婚第十二年毕第十三年始，为纪念这经历了访问延安、抗战胜利、国共和谈、创建民建、逃离虎口、新中国成立、黄出任首任政务院副总理等一系列不平凡事件，黄炎培处在一生事业顶峰阶段的不平凡岁月，也为庆贺这十二年中父母育下了我们姐弟四人，他俩特定制了紫红色纸夹，用来包装这一百多封信。上面父亲题：

灵 珰 百 札

黄炎培姚维钧共同生活第十三周年开始

一九五四年八月十六日北京

这便是《灵珰百札》的由来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1962年夏黄姚结婚20年，在北戴河父母照下纪念照，父亲又重新抄录了当年107封通信中的诗词，取名“灵珰酬唱和集”，母亲也重新抄录了她的诗词一并放入《灵珰百札》中。

我与《灵珰百札》相遇很早，四十多年前它就到了我手上。

但我与《灵瑯百札》又相识甚晚，直至2009年夏我才打开来读它。

1965年底，《灵瑯百札》主人之一的黄炎培病逝了，两年零一个月后的1968年初，我的母亲姚维钧也含冤离世，《灵瑯百札》便开始由我收存。1969年11月初，一声离京令下，我被迫卖掉家具准备离京接受改造，然而父母文字一类的遗物我是不能抛弃的。于是，我携上父母所留遗物，包括《灵瑯百札》，随我当时所在的北京外贸学院（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改称对外经贸大学），赴河南信阳固始县干校。这里曾是几千年前我们黄氏的发源地，我在此度过了近一年时光。次年的7月算是大学毕业，我被学校军宣队分配到山西太行山上高平县。十多年后物换星移，1985年已是中国社科院学者的我应邀赴美国先后在霍普金斯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、杜克大学等三所大学访学或攻读学位，在生活过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、纽约市和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，我所带行李中一直有父母遗物——《灵瑯百札》。三年多后我从大洋彼岸返回故国，回到北京，这些信札又伴随我在北京二十余年的生活，及至今日。

四十年中我不止一次拿出来想打开《灵瑯百札》，但我的手总是在颤颤巍巍，就如同我每次捧出红布包着的母亲遗骨（母亲的骨灰盒曾放在家中橱柜里多年），每次抚摸抚摸后又放回原处。无论在家还是在八宝山，

我始终未敢打开包有母亲遗骨的这一红包，也怀着同样的心情，在四十年里也未曾打开过《灵瑯百札》。《灵瑯百札》虽早在我手中，然而我与它真正相识，居然延迟了整整四十年。其间，先是大姐当当（黄当时）后又二姐丁丁（黄丁年），曾经取走翻阅各有年余时光。

如今我步入老年更懂得珍惜岁月，常思自己所余之年应当做些什么，同时冥冥之中总有话音在提示我：到了该把伴我半生有余的《灵瑯百札》等父母遗物整理出来的时候了。于是，在杨晓娟的鼓励与帮助下，我开始了与《灵瑯百札》的零距离接触，着手整理它。而巧合的是：父亲与母亲通信时是63岁，我去年着手整理它时也是63岁；父母通信八个月后结婚时父亲64岁，我花一年时间整理毕《灵瑯百札》之今年，恰也步入了64岁的年华。

我乃父母之子，我与《灵瑯百札》有缘。

《灵瑯百札》乃父母情感之灵，从我二十余岁始，它伴我几近一生。

我有责任整理《灵瑯百札》。因为我辈不仅要知晓上代人的奋斗，同时也应知晓上代人包括情感在内的心路历程，它是如此之真，真实而真切！如此之善，善良而善爱！如此之美，美丽而美好！一切奋斗之初衷和力量之源泉就在此，就在爱。

力量之源泉就在此，就在爱。爱人，爱家，爱国，

爱天下，爱同类，爱异性，爱生灵，爱自然。先辈们如此，黄炎培姚维钧也如此。

为此，我将《灵瑯百札》公之于世！

本书第一部分收录《灵瑯百札》中现今所存信 76 封；第二部分收录黄炎培与姚维钧结婚后的家书 23 封；第三部分集中收录黄炎培手抄黄姚情书家信中的情诗。有的情诗前后重复且用词不一致，这是因为黄炎培后来做了修改的原故。

序二：我读《灵瑯百札》

在我收藏《灵瑯百札》整整四十年后，我开始翻阅《灵瑯百札》，翻阅产生于七十年前父亲黄炎培与母亲姚维钧往来的这百多封情书。

《灵瑯百札》首封信写于1941年12月，当时黄炎培年纪六旬有三，姚维钧年纪三十又二，相差三十一年。姚维钧是首次与异性相交相恋，黄炎培则是丧失原配王纠思夫人年余。黄炎培早年婚事由于家境贫寒而不顺利。他出生于上海浦东川沙内史第，系书香世家，但少年时家境走向没落。13岁丧母，17岁失父，一年多后疼爱他的外祖父也去逝了。18岁的他不仅要养活自己而且要抚养两个妹妹，于是他去打工，站商店柜台，当会计算账。他写得一手好文字，所以川沙和邻县南汇的书院他每去投书必中奖金，但仍难以彻底脱贫。20岁过后，到了寻亲年龄却频遭拒绝，媒人介绍的第六家王筱云是位附贡生，读书人，早就读过黄的诗文，对之极有好感，便许诺其女王纠思与黄订婚。不久黄以第一名成



绩考中秀才，遂于 1899 年完婚，开始了四十余年的共同生活。

王家乃浦东南汇周浦镇人，婚后 18 岁的王纠思赴上海城东女学，学师范习养蚕，为人聪惠，善解人意，尤擅理财持家。黄王夫妇育有六男六女，其中一子二女早殇。黄长年在外奔走事业，办学兴教而苛己甚严。他 1902 年底办川沙小学堂任总理（校长）并授课，但他不领分文薪水甚至自带午餐，全家生活仅靠投书书院所获的奖金。尔后办开群女学、广明师范等，黄都取之有限。1906 年在杨斯盛倾囊赞助下，黄炎培开办浦东中学并首任其校长，本应领二百元薪水却只领八十元。在浦东中学，走出了左联五烈士中的胡也频、殷夫，中共总书记张闻天，国民党的蒋经国、蒋纬国，学者范文澜、罗尔纲等著名人物。长年的微薄收入对黄本人，更是对夫人王纠思的挑战，但擅长理财的王应对有方，挺了过来。我的大哥哥姐姐不少到了老年仍对童年清苦的生活记忆犹新，上顿豆芽，下顿豆芽，天天豆芽，日日豆芽。偶或偷跑出去打个牙祭，被父母发现了训斥一番。黄本人一件旧布袍穿了又穿，下身袍边破裂了索性拿来剪刀剪去，又穿上了。对这般清贫的生活，夫君为事业甘心，夫人也从不抱怨，心甘情愿挑起生活重担。其间政府两度下令任命黄为政府教育总长，一度任命黄为直隶省教育厅长，这些职位黄一旦上任收入当为不菲，但

均遭黄谢绝，甘心在官场外教育救国，都获得王纠思的充分理解与支持。1937年抗战爆发黄辗转内地至川渝，王留守沪上而竟成永诀，1940年12月王病逝。远在陪都重庆的黄写下丧妻之诗：

谁说天长地久来，
吾生万念一时灰。
悲欢聚散寻常事，
浑厚精明未易才。
去后茅檐犹待火，
来时玉镜不成台。
庸庸四十年闲福，
迸作昆鱼永夜哀。

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成功，太平洋战场上得逞一时。对中国，日本更加甚嚣尘上，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则进入关键时刻，中华民族处于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刻。

刚刚丧妻的黄炎培，身处远离家乡浦东川沙的四川重庆，更处在国难家亡的危急关头。

此时此刻，姚维钧走入他的生活。

他俩的相识就不乏浪漫。1941年11月黄炎培应邀来到贵阳，在大夏大学等处做抗日形势的讲演，听众之中即有32岁的姚维钧。大夏大学即是今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，抗战中为免受日寇奴役而从沪撤至贵阳。当时

她在此就读，即将毕业同时又兼做学校的教师助理，获得些生活补贴。听到黄炎培说着姚维钧所熟悉的浦东家乡语调，远离家乡、举目无亲的她备感亲切，又听黄炎培表达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抗日激情，未曾接触过男性的她极感钦佩，感动之下，姚维钧于1941年12月21日写出了他俩百余封通信中的首封。十分遗憾的是，恰恰是这封百篇情书的开门之作，自我接手保管《灵瑯百札》起，就未曾见过。但从黄炎培12月25日的回信中可以看出姚维钧21日去信的内容，为两点：一是简述自己的学习志趣，二是表达愿拜黄为师的愿望。但黄是很严谨，也不想浪费时间，25日他首封致姚信简短明了，既作为师长对姚不乏鼓励，又不乏君子风度、彬彬有礼，而且更有不拐弯抹角、直来直去的黄氏风格，信中还向姚索取简历。从此开始了黄姚之间浪漫的感情之旅。

从之后通信看，两人感情大致经历了师生同乡、好朋密友、情侣恋人、组织家庭四个阶段。虽然很难确切划分感情变化的准确日期，但走过了这四段感情之途是无疑义的。

黄炎培的先夫人去逝后，前来给他说媒者委实不少，虽然黄本人一张严肃的面孔，常人与之不敢苟笑，更不敢触及儿女情长之事。也有些小报，专门关注名人隐私。当时国民参政员中的第三方代表中，黄炎培与沈钧儒同为丧妻之人，因而备受这些报纸关注。有的小报

捕风捉影，无中生有捏合黄炎培与某著名女子大学未曾出嫁过的漂亮女校长，一时传得沸沸扬扬。但黄是有个性的人，他还沉浸于对先妻的悲哀与忆念中，与夫人常常重逢于梦乡，又于痛哭之中别后醒来，他这段日期的日记中不乏“哭”以至“大哭”的记载，黄炎培在这种心绪下，谈何再恋再娶。

然而对姚维钧，情形却有所不同，从黄给姚最初的一些信看，黄对姚从一开始就未拒绝。这是为什么？

首先，天地因缘。姚维钧是上海浦东南汇人，不仅与黄炎培同乡（黄家乡川沙在浦东，南汇与川沙相邻），而且更与黄的先夫人王纠思同乡。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而言，在黄的心理上，有时是将姚作为已逝的王夫人的替代者，从而拉近了与自己的距离。对此黄在给姚的信上也坦然相告，并不避讳。

其次，后天造化。黄与姚无论从年龄、从辈分、从身份都确应是师与生。从师生之谊开始二人的感情之旅，既为刚丧妻的黄接受，也同为未接触过异性的姚所认可，如果是通过媒人介绍，鉴于当时情形，黄与姚双方恐怕都是难以接受对方的。这种“浅入而深出”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也并不罕见。

1941年底，黄姚双方彼此向对方打开了通信交往之门，开始双方的感情之旅，次年7月姚毕业来到重庆，8月16日两人走进婚姻的殿堂，七个月中双方共通信

107 封。从这百多封信件看，总的来讲彼此的感情经历了从师生走向密友，从密友到恋人，从恋人走向婚嫁的相交、相识、相恋、相婚的四个阶段。

第一阶段：相交。两人通信以师生关系始，姚给黄首封信即表示拜黄为师，黄给姚首封信中说：“师事不敢当”，却接下来讲：“炎固乐与青年为友者”，从而事实上接受了双方以师生相待。之后的通信，黄称姚为“维钧”或“维钧学友”，姚则称黄为“任之老师”或“任之吾师”。双方来往信的内容多以介绍自己情况和询问对方情形为主，谈不上深入，也不可能有啥情感的交流，只是相交往的开始。

第二阶段：相知。大约从第十封信开始，即彼此各有五六封信的表述之后，两人进入相知阶段，从一般朋友逐渐变为密切的异性朋友。进入这一层关系，从姚维钧方面看，标志性内容是姚向黄叙述其离乡背井、远离家乡的心境，也叙述自己的校园生活，汇报学习状况如寄去毕业论文大纲等，对一个举目无亲的单身女学生来讲，纯属自然，合乎情理。而黄炎培方面的标志性内容，一则是大段大段地向姚叙述自己繁忙的生活，繁忙的公务，日程安排，二则是在给姚的信上流露自己埋藏于心的忧国忧民心理。时年已六十多岁的黄炎培，从早年丧父失母的农家孤儿，经历了求学、反清、被捕、逃亡、办学、革命、拒官、再逃亡、成名、抗战、参政等

一场场，一幕幕的人生经历，忧国忧民，救国救民，无疑已是他几十年生活的主旋律。特别是在抵抗日寇这一大背景下，尤其是在1941年和1942年中华民族的抗争进入最为关键、最为严峻的阶段，黄炎培的公务以抗日为中心，黄炎培的事业以抗日为主题，黄炎培的生活以抗日为主要内容，这是毫无疑义的，从当时黄给姚的信中看，这一鲜明特点几乎无处不在。而在姚这方面可谓志趣相投。姚维钧，1909年生于上海浦东南汇县周浦镇。祖籍是安徽黄山脚下的黟县姚村。祖上从商有成，桑梓乡里，多有善举。父姚旭明十六岁从安徽老家迁来浦东。姚出世不久，家道中落，十三岁时父亲辞世。她自幼天资聪颖，勤奋好学，无论做饭还是看护妹妹，手中老是捧着书。她原名薇娟，后来入了学校自取《诗经·小雅》中的两句：“秉国之钧，四方是维。”（要掌持国家权力，必维系各方人士），改名“维钧”。她在江苏省立淞江女子中学高级师范毕业后在本地从教。1937年抗战爆发，日军侵占上海，不肯做亡国奴的姚泪别母亲，只身跋涉，辗转香港、广州，到达贵阳，先求学在贵阳女师，后考入上海迁黔的大夏大学。对这样一个能舍家别乡，不甘做亡国奴的女青年，还能有什么比爱国爱家更能引起她的共鸣！当然，一个是已成就斐然的全国著名的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，另一个是尚未完成大学学业的学生，他俩之间的差距还是明显的！然而对于黄

来说，对于一个在事业征程上艰苦攀登的人来说，他最需要自己所爱的人的，与其说是理解，不如说是知悉；与其说是对话，不如说是倾听；与其说是她的“嘴”，不如说是她的“耳”。因为他要述说，他要告知，他要倾诉，他要宣泄深埋于内心的对国家对民族的爱，对“天降大任于斯人也”的责任的担当。一旦有这样一个能听懂他，愿听懂他的女性，此人无疑就是他之所爱了。黄炎培就是这样走进对姚维钧的爱恋之中。对男人尤其是事业型男人来讲，情感世界的奥秘就在这里。尽管黄姚之间年龄不对称（63对32），条件不对称（名人与学生、近十个儿女的父亲与未婚女性），信息也不对称，但只要各自所关注的均为天下之事，一切的不对称就都可以克服了，这些在黄与姚的恋爱过程中又一次得以证实。

第三阶段：相恋。应当是从黄给姚的第二十五封信开始，黄与姚这两位并未单独见过面（或严格讲姚在黄来贵阳作讲演时见过黄，而黄则是与之从未相见）的人走上了相恋阶段，从通信密友变为通信情人。黄在此信中向姚求爱了，1941年6月14日在汶川的黄在信中写道：

此小絨内一切希望你暂勿使第三人知。维钧，我确是很爱敬你，这几个月来太亲切了，人生有这样一种需要。过去有什么苦痛，有什么满意，有所得有所失，必